

# 环境史与环境社会学的比较与借鉴： 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

程鹏立

(重庆科技学院 社会学系,重庆 401331)

**摘要:** 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是社会科学对环境问题研究的两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两个学科的良好发展不仅关系学科自身的生存,而且关系现实环境问题的认知和解决。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诞生的时空场域和理论基础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环境史的发展过于强调跨学科的性质,有导致自身理论创新不足的危险,而且对社会变量关注不足也会造成解释力不够;环境社会学则缺少历史学叙事的冷静、全面和系统,而且过于关注当下,对历史事实掌握不够细致和充分。构建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在历史叙事方面学习历史学的研究特长,在社会变量分析方面发挥社会学的研究优势,有助于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两个学科之间互相借鉴。通过一个“癌症村”案例的研究分析,试图从历史叙事和社会变量的引入等方面,建立起两个学科互相借鉴和融合的分析框架范例。

**关键词:** 环境史;环境社会学;比较与借鉴;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 C919:X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5X(2017)05-0066-05

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并直接导致传统学科以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的诞生。从历史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中产生的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两门分支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新兴学科的缺陷也十分明显。本文站在比较的视野,对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的学科特点进行初步分析,希望促进两个学科之间的互相借鉴,从而促进各自学科的良好发展。本文还尝试通过一个案例的研究分析,建立起跨两个学科的视角与框架。

## 一、历史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环境史

### (一) 环境史的诞生与内涵

环境史作为一门分支学科最早诞生于美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的出现主要有两大社会背景:一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工业快速发展,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二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多种学科发展迅速,这些学科知识的不断积累为环境史的诞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sup>[1]</sup>。

直到现在,关于什么是环境史,学界还没有达成广泛一致的认同、理解和界定,但“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这个最一般的表述是能够得到大家的基本认同的<sup>[2]</sup>。①在环境史学界,标杆性人物对环境史的定义反映了该学者自身研究的侧重点及学术背景。美国环境史学会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力求理解自然如何为人类行动提供选择和设置障碍,人们如何改变他们所栖息的生态系统,以及关于非人类世界的不同文化观念如何深刻地塑造信念、价值观、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它属于跨学科研究,从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和其他许多学科汲取洞见。”

### (二) 环境史研究的特点

从研究环境史学科的文獻来看,在理论上,学者们大多突出强调了环境史的生态学基础;在方法上,学者们则更加强调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性质。

生态学学科的诞生要早于环境史一个世纪左右。有的学者认为,生态学对环境史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学发展出人类生态学

① 这种情况或许正是所有新兴学科的共同特征之一,表明了该学科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大约同时代在美国兴起的环境社会学也有类似的情形,相关的研究者总是遭遇“环境社会学是什么”这样尴尬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6-1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CSH040);重庆科技学院校内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CK2014B01)。

作者简介:程鹏立(1977—),博士,重庆科技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研究。

分支学科,学科关注的重点由生物主体转变为人类为主体,由自然生态系统到人类生态系统;二是生态学伦理化提醒人们关注人的权利之外的生物的权利<sup>[3]</sup>。简单地理解,生态学对于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在于把研究对象从“物”转移到“人”,另一方面却是相反的过程。还有的学者认为,生态学对环境史的意义在于“生态学意识”。这个意识主要体现在史学者在研究环境史时应具有历史的整体意识和人文情感<sup>[4]</sup>。笔者认为,“历史的整体意识”可能受生态学的“系统”和“共同体”等概念和思想影响较大,而“人文情感”和上文提到的关注生物的权利有内在的一致性。

环境史学者注重强调跨学科研究,特别是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跨越,自然科学主要包括生态学和地理学等。有的学者虽然没有使用“跨学科”这个概念,也还是强调了“多学科”,有的则是混在一起使用。

### (三) 环境史研究视角的不足

对于一门新兴的学科来说,强调研究方法的创新可能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但这种强调也可能把新兴学科埋葬在历史的潮流中。环境史研究者注重自然科学知识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但过于强调这点,而忽视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立场,常常使研究走向迷途。包茂宏认为,“环境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学叙述的基本特点”。他认为,环境史研究者应该“坚持历史学的传统特点,又要回应新思维的不断挑战”<sup>[1]</sup>。笔者比较赞同包的观点,新兴学科的研究者在坚持本学科立场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应该还是比较妥当的做法。

环境史研究的另外一个可能缺陷就是在研究中对“社会”这一变量关注不够。相关学者们几乎都在强调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中其他自然学科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但比较少地关注环境历史变迁与社会变量的关系。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环境史研究在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两个方面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研究结果缺乏解释力,或者说对当代社会的启示性意义不够。

### (四) 一个例外:社会史对环境的研究

在史学界,社会史研究者也开始把环境变量纳入研究范畴,考察环境变量对社会变迁的历史作用,社会史和环境史的交叉也产生了两个新的研究方向,分别是社会生态史和生态社会史,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环境史学者研究中的“自然史”的取向,但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sup>[5-6]</sup>。而且,社会史学者和环境史的研究者也还是从历史变迁的角

度关注“社会”变量,依然没有解决环境史研究的横向维度和“当下”关心缺乏等问题。

## 二、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环境社会学

### (一) 学科的诞生与内涵

历史惊人的相似,环境社会学和环境史的诞生时间和背景几乎一致。实际上,这与美国二战以后的社会经济大背景和学术繁荣有关。工业污染导致环境破坏,在实践领域,政治和社会领袖走在前列,积极倡导环境运动,终于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体系最发达的环境社会运动。在学术界,随着很多学术研究的重点由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的学术研究异常活跃,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传统的学术研究无法解释新的社会现象,于是一些新的学科和方向产生。环境社会学和环境史着实有着很多类似的学科理论基础,可以称为一对不同学科归属的堂兄弟(姐妹)<sup>①</sup>。

同环境史一样,环境社会学也一直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卡顿和邓拉普最早把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环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这个定义和环境史的经典定义如出一辙,“环境与社会”和“自然与人类”何其相似<sup>[7]</sup>。

### (二)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同环境史一样,生态学的发展也为环境社会学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理论源头。生态学对环境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类生态学”和“生态学意识”两个方面,而生态学对环境社会学的影响主要在于生态学研究中的“社会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以及“深层生态学”。社会生态学认为社会不平等是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性支配地位是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而深层生态学则强调了多样性和丰富性对地球的价值<sup>[8]</sup>。

跨学科也被环境社会学研究者认为是其重要的研究方法,然而随之带来的学科定位问题的争论也困扰了一些学者。卡顿和邓拉普认为是否直接把环境现象作为变量,是“环境社会学”和“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的分野。有的学者认为,环境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方法要基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环境不可以作为环境社会学的直接研究对象。虽然环境社会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但环境社会学不能包揽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所有研究层次,应该

① 洪大用对环境社会学产生的背景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参见“洪大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2).”

给自身准备定位<sup>[9]</sup>。

环境社会学界对学科定位的争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其学科研究视角的不足和引起争议的地方。这种争议早期体现在对所谓“NEP范式”的批评,讨论的焦点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物理性的环境变量还是“社会化了的环境变量”<sup>①</sup>。

### 三、通过比较走向互相借鉴

#### (一) 环境史与环境社会学的比较

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都是诞生于四十多年前的年轻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众多学科分支中能够幸存并顽强地活下来,本身就说明了这两个学科自身的生命力。两门学科均诞生于美国,同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进入21世纪后得到较高的社会关注,学科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中国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不仅体现在理论建设,也体现在方法建设上。

包茂宏总结了我国环境史研究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一点就强调了理论基础薄弱。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就不重视理论分析,到环境史研究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改善。相关研究的理论水平还停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定的分析框架里,并没有尝试综合性的研究。包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缺乏理论探索的精神进行了比较直白的批评<sup>[10]</sup>。相比较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也存在理论薄弱的问题,但学者们却对构建本土的环境社会学理论比较重视,且出现了一些中国本土化的研究概念、微观和中观的理论。这可能和两个学科的学科属性有关,历史学本来就注重依据史料来叙述历史,因而更加强调“史实”;而社会学历来重视从理论出发研究“社会事实”、检验理论或创新理论,总之又回到理论。当然,这种学科思维的长期训练对学者的研究会产生影响,但也不应成为没有理论创新的借口。无论是环境史,还是环境社会学,理论对话和创新应该始终贯彻研究的全过程。

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都是多学科知识积累和演化的结果,两门学科都强调跨学科方法和多学科知识的重要性。在环境史相关研究方法或方法论的文献里,我们经常强调环境史研究需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相关的学科门类众多。这种倾向有可能导致环境史研究偏离自身的学科立场,“多学科”和“跨学科”变成“无学科”,失去了历史学研究环境问题自身的魅力。当然,也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倾向的危害性,提醒环境史研究者研究的落脚点一定是历史学,否则就可能得出“灾难性后果”<sup>[11]</sup>。

在这些环境社会学的论文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些“灾难性的后果”,过多强调自然科学的知识,使得研究缺乏“社会学味”。对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者来说,研究具有自然科学属性的环境问题应该有较好的多学科知识储备,准确理解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特征,但研究立场始终应该是历史学或社会学的,始终坚持自身学科研究的范式。

#### (二) 走向互相借鉴:可能性探讨

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就像同源同宗的兄弟或姐妹,长大以后各自发展,且创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她们)还是可以精诚合作,继续做强做大。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缺点却依然明显。通过比较而互相借鉴对方学科的优点,在不改变自身学科属性的前提下,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都能获得好处,促进自身更好更快地发展。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各有可取之处。

在研究视角上,环境史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引入“社会”变量,形成“自然—人类—社会”研究链,丰富环境史的研究内容。目前,环境史研究更多地强调其跨学科性质中的“自然科学”属性,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自然科学中心主义”的特征,是一种缺乏学科自信的表现。环境史研究应该更多关注自然和人类关系变迁过程中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结构、社会性别等对这种过程的影响。对“社会”变量关注不足可能导致环境史研究对当代的环境问题,或者说是“当下”的环境污染关心不够,这也是包茂宏提出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存在的第三点问题<sup>[10]</sup>。相反,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借鉴环境史研究的历史视角。在研究中,环境社会学不仅要关注环境问题的“当下”现状,还有追根溯源,分析该问题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环境问题的“冷静、全面、系统的思考和认识”,而不是仅通过历史断面的认识“用道德诉求和煽情的方式来唤起群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激情”<sup>[1]</sup>。

在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上,环境社会学首先应当向历史学学习。历史学(环境史也不例外)十分擅长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细致的处理,并把“故事”讲出来。社会学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当下意识”,对把握新近发生的社会事实有较强的敏感

<sup>①</sup> 关于什么是 NEP, 参见“Catton W R, Dunlap R E. 'Paradigms, Theories, and the Primacy of the HEP-NEP Distinction'.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3.

性,但对历史事实的考据和分析显得关心不够或有意远离。其实,社会学本来就有历史主义的传统,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等都十分擅长利用历史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并出版了大量经典著作。这种传统沉寂了三十年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一门新的学科终于诞生——历史社会学<sup>[12]</sup>。环境社会学不仅可以从环境史,也可以从历史社会学汲取营养。对环境史来说,从环境社会学身上应该更多学习社会学研究者实地调查的方法和实证精神。一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研究在方法上一直占据较强的优势,积累了比较好的研究经验;另一方面,环境史研究者虽然强调跨学科研究,但仍然带有天然的浓烈的历史学的方法习惯,即不注重实地调查,历史学者中考古学者可能是例外。环境史研究与传统的历史学研究的区别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涉及到自然环境,研究者必须学会走出书斋,走向自然和社会。

在下文,笔者尝试运用上述的分析和结论,以一个“癌症村”为案例进行研究。由于笔者是一个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者,分析的视角基于社会学,但努力借鉴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促使研究走向更综合的层次。

#### 四、尝试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一个“癌症村”的案例

##### (一)“故事”的开始：古泉“癌症村”

“癌症村”是中国近十几年来随着工业、农业污染加重,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受损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现象,“癌症村”是民间和媒体的说法,并不是严谨的科学概念<sup>[13]</sup>。古泉村位于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下辖的T县,距离重庆主城不到50公里。<sup>①</sup>顾名思义,古泉村因有温泉而出名,在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时期,古泉村因为自然环境好,气候相对凉爽,还有养生温泉,吸引了国民政府一些政要在此设立居所和疗养机构等。然而,就是这样一座以环境好而闻名周边的小村,在2004年底却因污染严重和癌症高发成为地方和中央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到了2013年,古泉村更是成为了民间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地图”上榜的200多个“癌症村”中的一个。

为何有这样大落差的转变?笔者带领课题组成员分别于2013年5月和2013年9月两次进入古泉村,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并撰写了调查报告。从2013年到2015年,课题组还通过其他途径收集古泉村的其他相关情况,特别是相关的历史文

献资料,并对调查报告进行修改完善。

##### (二)如何讲“故事”:叙事

有的环境史学者认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就是写对历史进行语言上的故事化处理的叙述史学”,进而提出在面临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严峻挑战时,“环境史研究应该坚持历史学叙述的基本特点”<sup>[1]</sup>。实际上,这是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共同挑战,即“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叙事转向”。社会学也有重视叙事的历史,只是今天提高到叙事社会学的学科的角度,梅思也提出了叙事的三个基本要素<sup>②</sup>。

“污染—癌症”之间的关系,是“癌症村”社会学研究中最核心的话题<sup>[14]</sup>。在很多案例中,污染和疾病两个变量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因为污染以前发生,现在仍然存在,而疾病也是这样。在古泉村案例中,存在着有关污染和疾病的两种叙事:一种是文献资料的叙事;一种是调查发现的叙事。

##### (三)文献的叙事

有关污染的文献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期刊杂志,这部分较少,且时间较早,信息也很间接;另外是新闻报道,这部分信息比较充分,时间较近,主要集中在某段时间里,但是很直接。古泉村的最大污染源是一家造纸厂,这家造纸厂历史悠久,最早追溯到1937年左右。造纸厂最早由我国著名的造纸专家留德博士张永惠创建,后来被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掌控。1949年以后,造纸厂成为国有企业,1984年到1989年效益逐年变好,曾经是重庆市最大的造纸企业<sup>[15]</sup>。期刊《四川造纸》于1986、1990、1996年三期文章都提到造纸厂对环境的污染,分别有“对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对环境水体造成严重污染”“不仅不能饮用,就是作工业用水也影响到产品质量”等表述。新闻媒体对古泉村造纸厂的污染报道,主要集中在2004年11月22—24日这3天,《重庆晨报》连续3天对古泉村的污染进行了报道,正是这三天的报道把古泉村推向了“中国癌症村地图”的上榜村,之后,新华网等各大新闻媒体也转载了相关报道。这三天的连续三篇报道把污染直接指向了造纸厂造成的严重水污染,纸厂排放的污水有多种颜色,不仅污染河水,还污

① 依据学术规范惯例,论文对县及以下的地名,还有人名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② 参见成伯清发表在社会学视野网站的论文“叙事与社会学”,<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shehuiyanjiufangfa/dingxingfangfa/2008-09-24/6163.html>,2008年9月。

染了稻田。

有关疾病的文献集中在 22—14 日,特别是 22 日的报道中,记者一开始就交待古泉村近年的癌症死亡名单,并对这份死亡名单进行了分析,然后借卫生院医生的话,把癌症的病因指向水污染。根据多年对多个“癌症村”研究的经验表明,这常常是媒体揭露“癌症村”的习惯手法,先是从最吸引人的“癌症高发”出发,再把矛头引向当地的污染。

#### (四) 调查的叙事

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获取资料,是社会学田野调查的主要方法。实地调查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获得直接的感官体会,而且能够挖掘文献研究缺乏的材料,这些材料常常是由访谈对象讲出来的。

实地调查获取的污染和疾病的资料是互相交错的,没有截然分开。课题组的调查分 2013 年的 5 月和 9 月共 2 次,但通过调查和观察得知,古泉村的造纸厂在 2011 年左右就完全停产了,虽然厂子还在,厂里的设施也还保持原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污染已经不在,河水已经变得干净清澈,但是否仍然含有昔日污染留下的有毒物质不得而知。

对昔日污染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村民的回忆。村民们反映,造纸厂在生产的时候,不仅排放废气、飞尘,还排放污水。沿河附近的村民经常能够闻到很臭的气味,白色的烟尘不仅落在身上和头发上,还落在菜地里,像下雪一样。纸厂排放的污染不仅很臭,排入河里让鱼虾都绝迹了。河水和地下水都遭到了纸厂废水的污染,导致村民多次变更饮用水水源。

对照新闻媒体报道中的癌症数据,课题组成员通过实地调查也收集了一些癌症发病和死亡的数据。通过不精确的粗略统计分析,课题组认为从 1985 年到 2013 年靠近造纸厂的古泉村 5 组癌症发病和死亡情况比较严重,其中肺癌死亡的人数所占比例最大。这个结果和《重庆晨报》记者的统计结果基本相符。通过实地调查,课题组成员对癌症还有直接的感知,调查对象有患肝癌的妇女,初次调查的时候她还在门口晒太阳,再次去的时候,她却已经去世了。

(五) 更大的分析框架:其他“社会”变量的引入

如果说,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借鉴表现为在叙事上不断行走在历史与当下之间,那么,更多“社会”变量的引入将会使得叙事更有学术的意味。

在“癌症村”系列案例的研究中,居民对污染与疾病关系的认知与应对常常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变量,或者说污染引起的环境抗争是社会学家的研究热点<sup>①</sup>。在污染和疾病同时在“当下”存在的村庄中,研究者通过调查常常能够获得大量有关环境抗争的资料,相关的研究成果在环境社会学研究领域也较常见。在本案例中,非常特殊的是,污染和疾病都呈一定程度上的“过去式”,环境抗争的资料也就较少。

在更广的时间和空间思考古泉“癌症村”,会发现,污染与造纸厂有关,而造纸厂又和重庆的工业遗产有关。重庆的工业遗产主要来源于国民政府陪都时期大力发展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有关,另一个来源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初中国实施的“三线建设”。这些工业遗产一方面为重庆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很多环境破坏与污染。“工业遗产”与环境破坏将是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都可以研究的有意义的话题。

## 五、结语

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都产生于人类对环境破坏现象的担忧和关心,都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除了都强调跨学科研究特质之外,基于各自的学科归属,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都发展出了不同的研究特点,这些研究特点各有强调的重点,然而也暴露出了各自的不足和缺陷。环境史研究存在的可能不足就是过于强调跨学科特点,可能导致学科立场的迷失。另外,对社会变量关注不够,也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解释范围狭小。借鉴环境社会学强调社会变量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弥补环境史研究的不足。同样,学习环境史细致和系统的历史叙事方法,将会改善环境社会学研究的讲“故事”粗糙的缺点。通过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的比较,促使两个学科走向借鉴和融合,将会有利于两个学科更好地发展。

通过对环境社会学所关注的一个“癌症村”进行案例分析,可以把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借鉴和融合运用到实践,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限于作者的水平和文章篇幅的限制,案例分析还处于尝试性的阶段,今后的研究可以在实践领域进行更多的对话和讨论。

(下转 88 页)

<sup>①</sup> 关于更多“癌症村”的社会学研究案例,请参见“陈阿江,程鹏立,等.‘癌症村’调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15] Bergman E, Maier G, Tdtling F. Regions reconsidered: Economic networks, innovation,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M]. London: Mansell Publishing, 1991.
- [16] 李传喜, 胡筱瑜.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结构效率及其优化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3(7): 82-86.
- [17] Lengnick-Hall C A, Beck T E. Adaptive fit versus robust transformation: How organizations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 31(5): 738-757.
- [18] Lengnick-Hall C A, Beck T E, Lengnick-Hall M L. Developing a capacity for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rough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11, 21(3): 243-255.
- [19] 唐志军, 谏莹, 向国成. 权力结构、强化市场型政府和市场化改革的异化[J]. 南方经济, 2013(10): 1-19.
- [20] 常修泽, 高明华. 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推进程度及发展思路[J]. 经济研究, 1998(11): 48-50.
- [21] Soskice D. German technology policy,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1997, 4(1): 75-96.
- [22] 李春荣, 耿涌, 薛冰, 任婉侠, 董会娟. 基于 DEMATEL 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障碍因素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J]. 应用生态学报, 2012, 10: 2836-2842.
- [23] 李乃文, 徐梦虹, 牛莉霞. 基于 ISM 和 AHP 法的矿工习惯性违章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2(8): 22-28.
- [24] 李庭燎. 多元化战略异质性、系族企业控股权性质与 ICM 配置效率——基于熵指数法和中国 A 股市场数据的实证研究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8(4): 40-50.
- [25] Tzeng G H, Chiang C H, Li C W. Evaluating intertwined effects in e-learning programs: A novel hybrid MCDM model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and DEMATEL [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07, 32(4): 1028-1044.
- [26] Lee Y C, Li M L, Yen T M, et al. Analysis of fuzzy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11, 38(12): 14407-14416.

(上接 70 页)

#### 参考文献:

- [1] 包茂宏. 环境史: 历史、理论与方法 [J]. 史学理论研究, 2000(4): 70-83.
- [2] 景爱. 环境史: 定义、内容与方法 [J]. 史学月刊, 2004(3): 5-7.
- [3] 高国荣. 2005 什么是环境史 [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 120-125.
- [4] 侯文蕙. 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 [J]. 世界历史, 2004(3): 25-32.
- [5] 王利华. 社会生态史: 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Z]. 社会史研究通讯(内部交流刊), 2000(3).
- [6] 王先明. 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 [J]. 历史研究, 2010(1): 24-29.
- [7] Catton W R, Dunlap R 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J].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978(13): 41-49.
- [8] 程鹏立. 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起源与发展 [J]. 生态经济, 2013(4): 24-28.
- [9] 吕涛. 环境社会学研究综述——对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问题的讨论 [J]. 社会学研究, 2004(4): 8-17.
- [10] Maohong B.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J]. Environmental and History, 2004(4): 475-499.
- [11] 格里芬. 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 [M]. 马季方,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55.
- [12] 李华俊. 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起源、发展与前景 [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327-377.
- [13] 陈阿江. 内外视角“癌症村”——淮河流域黄孟营村的调查与思考 [Z].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 2012(6): 98-110.
- [14] 陈阿江, 程鹏立. “癌症—污染的认知与风险应对——基于若干“癌症村”的经验研究 [J]. 学海, 2011(3): 30-41.
- [15] 苟立异. 重庆造纸工业的一颗明珠 [J]. 四川造纸, 1990(3): 222.